

## 大家谈人生

## 百岁人生只做一件事

方汉奇

我今年100岁了。很庆幸，我的人生与其说是过关斩将，不如说是一场又一场的侥幸，算是超期服役了。

我出生于北京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籍广东普宁。我家与教育有渊源。曾外祖父林启在甲午战争后调任杭州知府，其间创办了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与养正书塾（今杭州高级中学等前身）。外祖父林松坚（字鲁生）曾留学日本并与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过同事，鲁迅日记中几次记载过两人的交游。我后来记日记，习的就是鲁迅的日记体。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很大。外祖父教我学习《左传》等经典，因此我习得“外圆内方”的处世态度；母亲常教幼小的我背诵白居易等人的诗篇、练习钢琴，使我至今热爱诗词和音乐。

少年时的我成长于动荡的年代，求学之路非常曲折。我上过7所小学。由于父亲的工作变动和时局变化，先后入读西安培德小学、西安女师附小、北京西直门小学，后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3年。这也是母亲的母校，不仅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高，而且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老师们总说“勿忘国耻”、教唱救亡歌曲《毕业歌》等，在学校里我常参演戏剧等文艺活动，后来我成了戏剧迷与此有很大关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被迫随家人从北京出发逃难到香港，在那里又读了3所小学，然后在九龙文化中学读初中。由于战乱，我不断转学，中学读了8年，在香港、上海、重庆、韶关、梅县、汕头等地换了8所学校。

读中学时，我就立下了理想：要做邹韬奋、范长江、萧乾那样的记者，“相机身挂，足迹遍天下”。到了报考大学时，我一不报收费高的学校，因为家里有6个弟弟妹妹要养；二不报没有新闻系的学校，因为要当新闻记者。1946年，我如愿以偿考入位于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那里名师荟萃，学校开设10多门专业必修课，还有丰富的文史哲艺课程。新闻系主任是著名新闻人俞颂华。马荫良、金仲华、叶圣陶、顾颉刚、王芸生、费彝民、曹聚仁等名家都曾任教或指导过我们。其中，马荫良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新闻图书

馆馆长，知道我成绩不错，就邀请我到该馆担任研究员。

上海新闻图书馆由解放日报社创办，安置了因《申报》《新闻报》停办而退下来的老记者老编辑。我到那里报到时，是馆员中唯一的年轻人。当时上海共有57家公私图书馆。我建议调查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并摸清新闻学藏书情况。1951年，《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附新闻学图书目录）》编印，收录了31家图书馆的收藏书报情况。在上海新闻图书馆的3年里，我看完了出版时间跨度达78年的2.7万多份《申报》，摘录了2万张卡片，这为我后来从事新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还在上学时，我就养成了摘录资料制作卡片的习惯，一辈子下来积累有几十万张，这些卡片为我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这期间，我还应邀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报系兼职讲授新闻史专题课，可以说，这为以后我长期从事新闻史教学埋下了伏笔。真正成为一名教师，要从1953年8月算起。我来到北京大学报到，正式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助教。从那时起，到2023年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整整70年，算得上是个“老园丁”了。

这70年里，我先后两次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第一次是1953年到1958年，是教学相长的一段时期。为了备好课、上好《中国新闻史》课程，翻阅了大量旧报刊，看了不下2000本书，寒暑假还到京沪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和搜集报刊资料、走访老报人，开展新闻史研究。第二次是1972年到1978年。当时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师资严重不足，我和人大新闻系大部分教师之前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于是整建制地被转移到北大。

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除77级本科生外全部转到人大新闻系。我跟随回到人大。这样，算上上世纪50—70年代在人大工作的十几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院）前后工作了6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致力于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了相关的书和教材，发表了论文，有的引起了很大反响。1979年，《报刊史话》出版，这是1964年我应吴晗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的一本书，但当时

未能出版。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共57万字，涉及报刊超过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余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200余处，算是我30年教学研究的结晶。

新闻史研究提倡“打深井”。要重视个案的深度研究，聚焦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域，或新闻现象、事件、人物等具体问题，进行纵向深度挖掘，而非泛泛而谈。要集中精力穿透表层史料，在特定领域持续向下开掘，通过对原始档案、口述资料、报刊原件等一手文献的系统梳理，揭示新闻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新闻史和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密切相关，可以从经济基础、政治格局、思想潮流等多维度揭示其发展规律，最终形成具有学术穿透力、延展力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形成对话。

1983年发表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就是我请新华社驻英记者拍录敦煌出土《进奏院状》，对其60行文字逐字逐句考订后，证实这是一份发行于公元887年的唐朝邸报，不仅是现存我国最早的报纸，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争议。

也是在那一年，我出版了教材《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此后，陆续出版了《报史与报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史的奇情壮彩》《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著作。1999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出齐，这是自1986年起，我和宁树藩、陈业勤等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20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共同编写完成的，共260万字，达到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13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新加坡出版英文版10卷本，成为“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作为一名教师，教学和研究之外，我还一直关注着新闻学这门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1984年我与复旦王中、人大甘惜分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随着新闻学教育蓬勃发展，至2023年12月底，我一共指导了52名博士研究生和6名硕士研究生。1998年，我写过一篇小文《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写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引起北大领导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重视。

我曾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回望百岁人生，我做到了。

关注，北大和清华先后在2001年、2002年创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指导的几位博士也参与了建设，这是我所乐见的。

为了促进新闻史的研究，1989年我发起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经几代人接力，目前成长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一级学术团体。很高兴，今天在老中青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是繁花似锦的百花园。

如今，虽然已迈入百岁，但我坚信，活到老学到老。从上世纪90年代古稀之年学习使用电脑，后来学会上网，到现在使用微信、开通微博，我一直紧跟时代发展。从时政新闻到文史哲书籍，至今仍每日学习，未敢懈怠。新闻学科与政治关系密切，不学习不知方向，“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严复语）。梁启超一生著述凡数百万言，均为政治谈。新闻学科还需要广阔的知识面。《十三经》《说文》及诸子著作等，章太炎都读过。梁启超在为《清议报》撰稿的一段时间内，读书100多本。杨振宁说过要把“天线”拉长一些。梅兰芳之所以成就高，就是因为师从多名家派，汇各家之长于一身。同时，要注意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除文史社科外，也要读一些好的小说。小说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可更形象地了解社会历史、异域风情等。

学习和研究要有所师承，先把前人的学问接过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起步；要有好的学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胆识，有真正的见解，不唯上，不唯书。做研究切忌当墙头芦苇，跟风、看形势、摸气候。要开拓求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板凳甘坐十年冷”。新闻史研究是新闻学的基石，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做学问就像盖房子，史料就是一砖一瓦，没有坚实的砖瓦，再宏伟的蓝图也只是空中楼阁。应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厚积薄发。

“考据如老吏断狱”，对史料还要学会“辨真伪、定是非、断取舍”。当年，我写太平天国新闻史的研究，只写了3000字的文章，却看了4个月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

我曾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回望百岁人生，我做到了。

天气真冷。车进申家沟，一路上坡，丹峦路由312国道分岔进来，至元岭顶60里，全

是这样的上坡路。前三四十里，是缓慢的上坡，偶尔还有平缓些的路段，越接近岭头，弯道越多，坡度越大，曲曲折折，仿佛一根被人丢弃的钢丝弹簧，也崭新，也斑驳，也硬，也柔。摩托车的挡位不得不从五挡递减到二挡，空气也一样，随海拔的抬升一点点降低，到了岭上，一地的薄雪，白茫茫一片。

我发现一个现象，即随空气温度降低，摩托车轮胎会渐渐变硬，失去弹性，抓地力变弱，所以，冬天骑行安全系数会降低，要格外小心。

很多年了，每个月都要在这条路上往往返返，我熟悉它的每一处弯道、路旁每一棵树。这里是秦岭支脉。像这里的无数支岔和流水一样，申家沟名不见经传，要说最让人记住的，也许有一样东西：柿子。

据说柿子在中国就有几十上百个品种，不同的地域气候产生不同的品种，哪怕同一品种，环境、气候、水土等条件不同，品质和品相也有差异。申家沟的柿子叫火晶，陈忠实先生有一篇散文《火晶柿子》写的就是它的同种。临潼与申家沟隔着500多里，一个在秦岭北边，一个在秦岭南面。我没有尝过临潼的火晶柿子，虽然曾多次从临潼原下路过。申家沟的火晶柿子除了那篇文章写到的诸多特点，还主打一个甜，不一样的甜。火晶柿子像它的名字一样让人喜爱，小巧玲珑，晶莹剔透，那种红，实在找不到词语来描述，火红也不是，彤红也不准确，果实界有无数种红，没有一种与它相似。我曾在祁连山某处见过被山峦即将吞没的落日，那最后的半轮火红，偶尔有一次与它相近，但稍纵即逝。看到这样的落日需要机会和运气。熟透的火晶柿子，仿佛吹一口气就会破掉，其实它无比皮实，任风雨怎么摇晃枝头，也休想把它吹打下来。

火晶柿子没有核，没有瓣瓣，剥掉那极薄的皮，一下子就会软塌下来，失了形状。那薄薄的皮充满韧性，风把它带到很远的树枝上、草尖上，挂住

了，像开了一朵红花。因此，吃的时候，要剥一半皮，吃掉一半，然后再剥再吃，一下全剥了，只能用手捧着它。

火晶柿子的甜，分好几个层次，入口是一种，入喉是一种，下了肚子，空空气中残留的余味是另一种。最妙不可言的是，它挥之不去的余味。好酒挂杯，火晶柿子的甜也一样，入口浓，入喉烈，余味特别悠长、回甘，吹气如兰。我常常摘几个柿子吃了，骑车又上路，一路上余味都在口腔里，找一眼山泉，初入口的泉水也因那余味变得甜润了，多喝几口才渐渐稀释、冲淡。

在父亲和村里同龄男人们的青春时代，乡里还没有通公路，他们有一项任务，那就是隔三差五要把乡里供销社的山货挑到县城总社，再把城里的油盐酱醋茶挑回村里，当地人叫挑脚，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从峡河到丹凤县城130里，需翻山越岭。父亲他们挑100多斤的担子，再加10斤干粮，一天去，一天回，挣两个半工分。本来一个人一天只有一个工分，那多出的半个，算是对辛苦的奖励。父亲说最喜欢冬天挑脚，一路上不冷，还能吃到申家沟的火晶柿子。

父亲还年轻时给我描述过炒面拌柿子的情景。炒面就是用炒熟的黄豆、玉米、谷子磨成的面。出门时，带一小袋炒面、一只碗，别的干粮就不再带。把炒面倒在碗底，将柿子剥去了皮，与炒面反复搅拌，最后拌成一个团，又甜又糯，特别顶饥。想让炒面团软一点，就多拌几个柿子，想硬一点，就少放几只。吃了炒面，再带几个柿子上路，顶饥也顶渴。父亲说，最好吃的是，在炒面团上再浇一层柿子的汁，特殊甜，特别香，但一般人想不出来这样的美食做法。

从申家沟口白衣寺进来，在15公里界碑对面，有一个石人，一丈多高，有头有脸，惟妙惟肖。父亲曾说，那是他们歇脚拌炒面的地方。每次骑车路过，我都会停下来看一眼它。父亲离开这个世界10年了，他肩挑背驮的生活更加遥远，但每次我总依稀看到他们在石人下拌炒面，歇脚。

串烤肉、半只烤馕，便已领略人间臻味。这天来得晚，远远就盯着桥下看，居然还亮着灯，心里一阵温暖。只剩花帽哥一个摊位。见到我，他依然友善地笑着，指着身后塑料棚说，冷得很，温室坐。所谓温室，是用四根铁杆蒙了一层塑料布，隔出七八平方米的空间。铁炉上的茶壶冒着热气，头顶的白炽灯明亮，温室里温暖敞亮。长条桌边坐着一个男人，斜靠着一支拐杖。看见我，男人笑了一下，示意我坐。花帽哥倒了一杯热茶，愧疚地说，不好意思，就剩一只烤馕了。我说，玻璃柜里不是还有十几串烤肉吗？花帽哥指着男人说，他都订了，给妻子的。我说自己累一天了，就想弄几串烤肉，就着烤馕，饱餐一顿。附近只有这个摊位了，没别的地方能去了。花帽哥为难地看向男人。男人想了片刻，说，好吧，艾山江大哥，给这个兄弟分五串烤肉吧。现在可

以烤了，我老婆也快到了。

不到10分钟，一辆厂车停靠在路边。男人赶紧拄着拐杖出门。不多一会儿就引着一个女人进来。男人冲着外面喊，艾山江哥，上烤肉。

热腾腾的烤馕端上来，馕饼上铺着一排喷香的烤肉。花帽哥在女人面前放下盘子，然后拍着男人的肩膀说，小赵兄弟，今天你老婆生日，你们好好吃。说完，转身出去收拾烤炉了。

男人拿起一串

提起《儒林外史》，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范进中举后的疯癫、严监生临终前的吝啬。二人身上尽显封建社会功名利禄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也为这部作品定下辛辣深沉的讽刺基调。不过，吴敬梓也写下了一些底层人物的温厚与亮堂，尤其是戏子鲍文卿，与范进、严监生等被名利裹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鲍文卿首次出场于第二十四回“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安东知县向鼎因牛浦郎的讼事被按察司崔大人准备参劾，鲍文卿不顾自身身份低微，跪地向崔大人求情，直言向鼎有真才学、非貪赃枉法之辈。向鼎得以保全官职后，赠银500两致谢，鲍文卿坚决不受。

第二十五回“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写10余年后向鼎升任安庆知府，与鲍文卿重逢后待之以“老友”。鲍文卿虽成知府身边红人，却始终坚守底线。面对安庆书办以500两银子诱使其说情的请求，他严词拒绝，原文是这么写的：鲍文卿笑道：“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门里好修行’。你们伏侍太老爹，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爹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几句话说得两个书办胆战心惊。

鲍文卿的言行，让“君子”二字从士大夫的书斋落到市井戏台的方寸之地，更给后世身处权力周边的人立起“近权不贪权、得势不越界”的人格标杆。

鲍文卿帮人不图报的举动，即使今天看来，也很有启发。现实生活，确实有少数领导干部将“为民服务”当作“政绩资本”，事先算回报，忘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鲍文卿身处底层尚能纯粹为他人考量，

领导干部更应回归公仆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踏实践行不求回报。鲍文卿“得势守底线、辨边界”的清醒，对领导身边人极具教育意义。现实中，有的人借亲近领导之机狐假虎威、谋取私利，最终害人害己。而鲍文卿始终认清自身位置，不攀附、不越权、不谋私，这份清醒，正是领导身边人需要锤炼的品质、守住的本分。

其“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的执念，既是对不义之财的拒绝、对自身职责边界的厘清，更是公职人员浮躁心态的清醒剂。领导干部需摒弃投机取巧的政绩观，踏踏实实办实事；身边人应摒弃“借权获利”的侥幸，明白唯有靠自身能力获得回报，才能心安理得。

此外，鲍文卿“公门里好修行”的理念，为领导干部处理“情与法”“私与公”的关系也提供了启示。面对书办钻营，他既拒绝说情不纵容过错，又以劝诫给予警醒，在规则与人情间寻求平衡。这对领导干部亦有启发，既坚守原则不突破底线，又善于共情，让公权力有力度也有温度。

鲍文卿身处底层不自轻、不权不卑不亢的态度，更回应着当下的“身份焦虑”。个别领导干部身居高位自满膨胀，身边人恃势凌人，皆因囿于“身份焦虑”，丢了自我认知，忘了品格才是真正立身之本。

鲍文卿的“清骨”，藏在“利他不求报”“界守不逾矩”的朴素准则中。在公权力运行愈发规范的当下，这份“清骨”对领导干部涵养初心、身边人守住本分意义深远。守住这份朴素，便守住了公权底色与人心温度。

**金台随感**

质、霉变、虫伤的都不能用。水则取自本地百米深井，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再就是酒曲，这是甜酒的灵魂，长乐甜酒用的酒曲是由植物发酵制作而成，不含任何化学添加成分。

在工艺上，解淘要用开水兑冷水，比例要适当，这样能迅速降温。解淘要充分，用水淘洗2至3次，边淋水边把米抄匀，至每一粒清清爽爽。酒曲的量要刚刚好，少了，发酵不充分，吃起来没有酒味，多了，甜酒会变苦。发酵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温度低了，甜酒无法发酵，温度高了，酒就“糊”了。时间也一样，短了，酿不出酒，长了，酒会变酸，有股刺鼻的味道。

还有一点，熊爹再三强调，酿酒的器具必须干干净净，但凡有一点不干净，哪怕沾有油、盐、酱油之类的东西，酒都会发霉变酸。

看起来晶莹透亮，吃起来唇齿留香，除了直接食用，还可以做甜酒汤圆、甜酒冲蛋以及各种花式甜品。长乐甜酒不仅好看、好吃，还营养丰富。

起源于宋代的长乐甜酒，今天已是当地一块响当当的牌子。甜酒古法作坊、甜酒文化馆、甜酒产业园，长乐镇把甜酒做成了一个品牌。这个汨罗江边的小镇，成了闻名遐迩的“甜酒小镇”。

甜酒看起来晶莹透亮，吃起来唇齿留香，除了直接食用，还可以做甜酒汤圆、甜酒冲蛋以及各种花式甜品。长乐甜酒不仅好看、好吃，还营养丰富。起源于宋代的长乐甜酒，今天已是当地一块响当当的牌子。甜酒古法作坊、甜酒文化馆、甜酒产业园，长乐镇把甜酒做成了一个品牌。这个汨罗江边的小镇，成了闻名遐迩的“甜酒小镇”。

花帽哥收拾完桌子，关了灯，整个桥下一片黑寂。只有还未烧完的火炭在烤炉里发出暗红的光，让夜色依然笼罩在温暖之中。

**多味斋**



▲中国画《月光曲》，作者薛亮。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天地

熊红久

## 温暖的烤炉